

論語海讀

趙松元 张中之◎编著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

華元仁者

釋淨心時年八十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出版社

论语 海读

赵松元 张中之◎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语》讲读 / 赵松元, 张中之编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01-11706-5

I . ① 论… II . ① 赵… ② 张… III . ① 儒家 ② 《论语》—研究 IV . ①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7480 号

论语讲读

LUNYU JIANGD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陈 烨
策划编辑 罗建云
装帧设计 

制版印刷 广州尚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东莞市潇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6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录

CONTENTS

导言	/ 2
学而 第一 讲读	/ 31
为政 第二 讲读	/ 52
八佾 第三 讲读	/ 73
里仁 第四 讲读	/ 99
公冶长 第五 讲读	/ 113
雍也 第六 讲读	/ 137
述而 第七 讲读	/ 165
泰伯 第八 讲读	/ 195
子罕 第九 讲读	/ 214
乡党 第十 讲读	/ 230
先进 第十一 讲读	/ 244
颜渊 第十二 讲读	/ 269
子路 第十三 讲读	/ 290
宪问 第十四 讲读	/ 312
卫灵公 第十五 讲读	/ 340
季氏 第十六 讲读	/ 362
阳货 第十七 讲读	/ 374
微子 第十八 讲读	/ 393
子张 第十九 讲读	/ 401
尧曰 第二十 讲读	/ 413
后记	/ 418

目录

CONTENTS

导言	/ 2
学而 第一 讲读	/ 31
为政 第二 讲读	/ 52
八佾 第三 讲读	/ 73
里仁 第四 讲读	/ 99
公冶长 第五 讲读	/ 113
雍也 第六 讲读	/ 137
述而 第七 讲读	/ 165
泰伯 第八 讲读	/ 195
子罕 第九 讲读	/ 214
乡党 第十 讲读	/ 230
先进 第十一 讲读	/ 244
颜渊 第十二 讲读	/ 269
子路 第十三 讲读	/ 290
宪问 第十四 讲读	/ 312
卫灵公 第十五 讲读	/ 340
季氏 第十六 讲读	/ 362
阳货 第十七 讲读	/ 374
微子 第十八 讲读	/ 393
子张 第十九 讲读	/ 401
尧曰 第二十 讲读	/ 413
后记	/ 418



第一节 经典与经典学习

一、经典·轴心时代·中华元典

(一) 经典释义

经典又称“原典”，也写作“元典”，《辞源》释曰：“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1]《现代汉语词典》释曰：“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2]但这两种解释都显得比较笼统，按我们的理解，所谓经典是指各民族古老的、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并在各民族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文化典籍。

在汉字文化中，与“原典”含意切近的词汇是“经”，其本义是指织物上的纵向的纱或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系部》说，“经，织也。从系，巛声。”清段玉裁注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甲骨文无“经”字。郭沫若认为，“经”的初字是“巛”，而“经”是后起字。学者一般推断殷商时代尚没有“经”。“巛”“经”两字，首见于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意谓“经纬四方”，这里，“经”字意指“经营”。自战国开始，“经”方含有经典之意。如《荀子·劝学》有“始于诵经，终乎读礼”之说。“经”本为书籍通称，两汉以后尊经，则专指“圣人之书”。所谓“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3]又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4]

与“元典”含意近似的另一词汇是“藏”。“藏”指经典总汇，多卷本圣典，如佛教经典

[1] 《辞源》，1915年10月正编初版，1981年12月修订第1版。

[2] 《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12月第1版，2005年6月第5版。

[3]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六）之《释典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 陆侃如、毕世金：《文心雕龙·宗经篇》，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1页。

总称《大藏经》，道教经典总称“道藏”。

（二）轴心时代与元典井喷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文明古国，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人物，出现了许多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文化典籍——可以称之为“原典创生期”，即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1000年间，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的400年间，是世界文化史上原典形成的关键时期。除东亚的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等文化巨人外，在世界范围内，从东地中海沿岸到南亚次大陆，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佛陀释迦牟尼（印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公元前9世纪至前6世纪的希伯来或犹太预言家，又称“先知”）、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等等。

在典籍方面，南亚、西亚、南欧诸文明民族出现了如下著名的典籍：

《吠陀》（Veda）。印度上古时期文献总集，是印度宗教、哲学、文学、文明的基石，历来被认为是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该作品产生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前，最晚约在公元前6世纪。“吠陀”本义是“知”“知识”。有广狭二义：狭义指最古老的“四吠陀”；广义指4部本集及附加文献。其附加文献主要包括由散文写成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吠陀》包含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史迹和文学创作，为研究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印度被尊为圣典。

《古圣书》是波斯元典；《伊利亚特》、《奥德赛》（荷马）、《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元典。

（三）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元典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堪称原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和《春秋》等“六经”。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公元前53—公元前23）继承乃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领校秘书府之书，著《七略》，首次对图书作系统编类。《七略》将当时天下典籍分作六部三十八类，而六部之首便是“六艺”，也即“六经”。因《乐》亡佚（一说古时即无作为典籍的《乐》，乐是与诗、礼相配合的谱曲，已失传），汉代流行者仅《诗》《书》《礼》《易》《春秋》，故汉人多称“五经”。汉武帝建元五年时立“五经博士”，“五经”之名更为流行。此后，这五部书分别名《诗经》《书经》（《尚书》）《礼经》（《仪礼》）《易经》《春秋经》。

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如《论语》《孟子》被儒家列为主要经典，是“九经”“十三经”的组成部分，宋以后又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被宋元明清诸代中国人奉为“圣经”。《老子》《庄子》则被道家和道教列为主要经典，分别称《道德经》和《南华经》。《墨子》被墨家视为经典。它们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也被后人称为经典，如《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有“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的美誉；又如《黄帝内经》是医学经典，陆羽《茶经》是茶学经典。此类典籍因其原创性而赢得不朽。其精义至今为相关专业所尊崇，成为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至于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则除《诗经》外，还有楚辞、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建安诗歌、左思诗、陶渊明诗、鲍照诗、二谢诗、庾信诗以及唐诗、宋词等，它们都是中国诗歌精华

中的精华，都具有经典的意义。

二、开卷有益：经典学习的重要意义

（一）经典学习与文化复兴

先讲一讲犹太人的经典文化教育。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向来被认为是特别富有智慧的一个民族。世界上犹太人的数量大约有1000多万，约占世界人口的0.3%。但是，在世界政治、艺术、科学和思想各领域，约十个领导性的人物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或犹太后裔。1902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约有32%得奖者是犹太人。

那么，犹太人为什么这样优秀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犹太人彻底普及了全民族的终生的经典教育制度。

犹太民族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理念：从幼年开始的经典教育，即是对记忆力的良好培养，也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洗礼，唯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很好地培养起学习和创造的能力，今后才能取得成就。因此，犹太人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经典学习就已开始。父亲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读经典给摇篮中的婴儿，并且每次读完后都在婴儿稚嫩的嘴唇上抹上蜂蜜，让孩子知道读书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孩子3岁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背诵祈祷文；孩子到了5岁就开始背诵《圣经》《摩西律法》；到了7岁则学习《圣经旧约》的剩下部分，而且还要接触《塔木德经》的基础知识。在满13岁接受成人典礼之前，要学完所有的犹太教法典的基础经文和圣著。他们的学习的方法是配合着旋律，反复朗诵，直至能够背诵。由此可见，犹太民族之所以成为特别富有智慧的一个民族，是与其高度重视经典文化教育分不开的。

犹太人的这种经典教育，应该能够引起我们的深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典教育由失落而走向复兴。

1. 失落：两种冲击

“五四运动”时期，激进主义者喊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这可以说是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传统经典文化在现代受到的第一次冲击。而自1949年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中国传统的经典成了“四旧”，成了“垃圾”。在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包括古典诗词在语文课本中所占的分量极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中，解放后的几代中国人不熟悉经典，对古典诗词也所知甚少，以至“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世纪在我们本土”“逐渐失落了”^[1]。

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什么“快速面”“快餐文化”等等，好一个“快”字了得！因为快，当代人的情感越来越粗糙，越来越不懂得细腻地感受，仔细地品味——一句话，人们越来越丧失审美的能力。处在这种快节奏中的当代人，甚至连最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读书活动也受到了影响——人们被各种眼花缭乱浅尝即止式的阅读弄得越来越不踏实，往往习惯于读点花边新闻、看点肥皂剧、看微信。经典原著根本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耐心读，即使读，也只读《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品三国》《说红楼梦》……嚼的是别

[1] 陈平原：见《深圳风采周刊》《51个孩子的读经试验》一文，1998年第258期。

人嚼过的馍，懒得读原著。于是，易中天火了，于丹火了，但人们根本无法体验原著的精妙而耐人寻味的语言和抑扬顿挫的节奏。我们的经典文化的精义和高贵，就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中受到了严重的解构。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某机构曾对某大学中文系的大二以上学生做过调查，结果是：学生们对《红楼梦》的了解，70%是来自于电视剧或电影，20%是来自于教材的介绍，只有10%的人读了原著。若问他们为什么不读原著，回答几乎一样：了解故事梗概就可以了。这是何等可悲的事！

《羊城晚报》记者曾就当代大学生经典学习的现状作了一个调查，并写成《名著被大学生遗忘了吗》一文，刊载在2010年4月9日B7版。调查显示，现代大学生读经典的时间越来越少，读书结构浅层化、功利化。文章指出：

现代大学生阅读书籍以流行小说、励志小说、人物传记为主，传统经典名著少人触及。许多大学生接受采访时坦言，现在越来越少有时间和心情读名著了。被就业、升学、出国等纷扰着，没有心思埋头读“用不着”的名著，只愿读“有用”的英语、计算机及专业书。他们更觉得，大学已经失掉读名著的氛围了。

在描述此一现象后，记者满怀忧虑地说：

问题是，不读名著，就很难触及文化核心。这是否意味着，新一代人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层次化？是否意味着社会更浮躁，更庸俗？

在这里，我们希望读者诸君对文中提出的问题好好掂量掂量。而实际上，这位记者所看到的问题固然严重，但还只是表层现象，其深层的问题是“礼崩乐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严重“断裂”。这具体表现在：其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礼仪文化以及内蕴荡然无存。其二，由古圣贤人建构的高贵精神轰然倒塌，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泛滥成灾，道德滑坡，理想失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其三，当代中国人缺失了古典文化的底蕴，无力传承绵延久远的人文传统。如果长此以往，则将对国计民生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影响。

2. 复兴：一个目的

在当代中国，进行经典文化教育不失为传承高贵文化精神、改善国人素质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中小学，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中，注入经典，注入古典诗词，以优化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帮他们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则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关系到青少年人格健康成长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复兴的大事。

这一问题，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经引起了许多睿智之士的关注。国家图书馆成立了一个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并于2001年初发起了一个“经典文化建设工程”，引导13岁以下的孩子诵读古今中外的经典篇章，从而达到文化熏陶、智能锻炼和人格培养的目的。

2001年，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上，饶宗颐先生发表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关于经典的重要意义，他有一个表述：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的思想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

“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事物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类学。

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合的互联网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展望未来：

我充满信心地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的世纪。

我们认为，饶宗颐先生的这番话语，是高屋建瓴、充满睿智的言说，可以说，是我们读经的明灯。而他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 21 世纪的文化建设，则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值得我们三思。

（二）经典诵读与人格培养

1. 吸取道德精神——芳馨人格，提升境界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境界层面。人生的真义就在于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北大著名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贞元六书·新原人·境界》中根据人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意即理解、觉悟）的不同，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一划分虽然不是十分严谨，但它对于我们明确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并明白要不断努力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人处在不同的境界，所拥有的是不同的人生风景。站在高山上海旁与站在小土丘上小沟旁，当然会看到大不相同的自然风光。使自己站得越来越高，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人类之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动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中所蕴涵的哲学底蕴，理解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追求。

那么，如何去芳馨人格，提升境界呢？经典告诉我们两个字：“修身”。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基石。修身的核心，是养成健全的人格。我认为，健全的人格应该体现在如下四端：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这十二字，是孔门教学之目的，也是孔子学术思想之中心。孔子立己立人，皆以此四端为要求：

“志于道”，与人生的格局和方向相关。这就要求士人君子的修身，要立志于仁道、道义，立志于人生最高最基本的准则。此一立志思想，表征着对高远精神境界的追求，凡有此追求者，其人生格局必大，人生境界必高。

“据于德”，与人生的基本修养相关。“德”是我们人生的根据地，如果没有这根据地，则人之生存于世，人之一切行为，人之与人的交往，就失去了根本。所以“据于德”是士人君子必须具备的修养。

“依于仁”，与君子人格追求相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现今通行的《论语》文本中出现了109次。孔子对“仁”的含义作了多方面的发挥，其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解释是“爱人”。要做到“爱人”，就必须养成“恭（庄重）、宽（宽厚）、信（守信）、敏（勤敏）、惠（慈惠）”的品德，这五种品德，贯穿着人与人之间既要自尊自重，又要互尊、互爱、互信的基本精神。

孔子不仅规定了仁爱表现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具体品德，而且提出了在人与人之间如何实行仁爱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和“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别人也会有着同样的要求需要满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所不希望得到的，也是他人所不希望得到的。前者谓忠，后者谓恕。这样的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行仁爱的方法。

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我们应当把“里仁为美”作为座右铭。

也许有人要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都是很高的精神追求，但我们要生活呀，难道不能追求功名利禄吗，不能追求富足的生活吗？人生在世，有功名利禄的世俗追求，无可厚非；人生在世，也必然要追求富足的生活。即使是孔子，也是如此。孔子不仅不反对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而且还曾公开表示了对富贵的追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的时候，不能牺牲精神生活的崇高；在追求富贵的时候，要符合道义，所以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不义而富且贵”，则“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正是由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孔子才拥有了这样一种超越世俗的高贵精神。也就是说，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我们就不会沉溺于物欲的泥沼。在当代社会，腐败问题、贩毒吸毒问题等等愈演愈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鹿奶粉的新闻、郴州儿童医院用工业氧气冒充医用氧气导致的新闻等等，乱七八糟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灵世界出现了严重问题：传统伦理精神已然崩溃，许多人心中已没有道德底线，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使人心不古，廉耻丧尽、唯利是图、物欲横流。所以，要革除社会弊病，就要医治残缺的心灵，要医治残缺的心灵，就需要传承和弘扬以经典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的高贵精神。这一问题很值得我们三思。

最后是“游于艺”，这与人生的丰富性相关。“艺”，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乐”，指音乐、舞蹈等艺术；“射”，指拉弓射箭。古代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御”，指驾驭马车。“书”，文字书本知识、写作以及书写等，都可以称之为“书”，这是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数”，指算术。这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六艺，是古代的六种科目，孔子教学就是以六艺为主。学会了六艺，才算是有了真才实学。“游于艺”表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养成渊博的学识、多样的技能，还要养成艺术的情趣。“游”，包含有涉历之意，但同时带有一种自由感或自由愉悦的含义，当然也包含有游戏、观赏、娱乐的意思。从而，这个“游”字，就带有了审美的意味。这个“艺”，虽然不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但包含艺术在内，它表明孔子对于艺术在实现人的全面人格理想中的作用的重视。艺术能够怡情养性，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说，“游于艺”能滋润心灵，使人的精神生命在审美活动中得以丰富、充实、超脱。一个人如果只有高远的志向、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没有丰富的知识、不掌握生活的基本技

能，没有艺术的修养和趣味，这样的人生难免枯燥乏味；但一个人仅仅游于艺而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则心灵无处安顿，容易走火入魔。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与游于艺四者具备，全面发展，才能培养成健全的君子人格。

总之，此四句意谓：立志在道（这样人生才有正确的方向，人生格局才够大），据守在德（这样人生才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依凭在仁（这样人生达到最高最美的境界），游憩于六艺（这样人生才丰富多彩）。夫子十二字，说出了人生修身养性的四个方向，规范性地提出了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

2. 吸取诗性智慧：诗意安居，汲取智慧

其一，培养诗意安居的精神品质

何谓诗性？“诗性”即指诗的性质，她是人的性灵中最柔软、最温馨、最纯真、最有诗意的部分，是人之能够在大地“诗意地安居”的精神品质，我们认为，这应是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这种精神品质当由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构成。前者主要包含良善、纯真、自由和美；后者则含蕴着优雅的趣味、宁静的心态、浪漫的情怀以及好奇心、想象力等元素。这种“诗性”精神是为人的现实生存提供超越意义——或者说是能够使人“诗意地安居”的根本保证。中西哲人，虽然文化背景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描写过赞美过这种“诗意安居”。如孔子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何等富有诗情画意！晋陶渊明有《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对从世俗社会中超越而出的诗性生活的典型表现；西方诗人荷尔德林则写道：“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 仰天而问：难道我 /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 和纯真尚与人心为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 神湛若青天？我宁愿相信后者。 / 这是人的尺规。 / 人充满劳绩，但还 /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 就连灿烂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人生是忙碌的、辛劳的，但比忙碌和辛劳本身更可怕的是没有诗性之光的照耀。人只要在内心中培养起良善、纯真的这些美的品性，也就具有了“诗”之性情。人秉持这种“诗性”，就会拥有直面现实、超越世俗的人格力量。所以海德格尔说，“在这纯属辛劳的境地中，人被允许抽身而出，透过艰辛，仰望神明。……”人，要有一种从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中“抽身而出”的精神品质，惟其如此，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意安居”。这是诗性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提高情感智商的水平

情感智商也是一种重要的诗性智慧。情感智商（EQ）又称情绪智力，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人格心理中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它主要表现为自尊、自觉、自信的意识、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意志、乐观向上的精神、富有同情心，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等等。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认为，情感智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自觉意识。因为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二是能妥善调控自己的情绪。即能调控自己。三是自我激励，保持乐观心态，它能够使人走出生命中的低潮，重新出发。四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这是与他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基础。五是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心理学家们认为，情感智商水平高的人具有如下的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情感生活较丰富但不逾矩，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

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事实证明，情感智商的高低在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

当代青少年心理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情商不高：他们大都为独生子女，虽然他们被称为“小太阳”，倍受长辈的娇宠、爱护，但他们缺失一份兄弟姐妹的友爱，孤独而封闭，形成了十分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加上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往往侧重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忽视了情感体验层面的教育，忽视了情感智商的开发，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多是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学生。自私、封闭、狭隘，情绪容易低落，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缺乏坚强的意志力，往往使他们在困难与挫折面前无所适从。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把提高学生的“情商”作为重要内容。那么，从经典文化中吸取人生智慧，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因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包括古典诗词中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情商内容。如《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的本质特点是健，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止无息。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这就是一种人生智慧。优秀的古典诗词中也蕴涵着丰厚的情感智商。又如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立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此处“昨夜”句出自晏殊《鹊踏枝》词；“衣带”句出自柳永《凤栖梧》词；“众里”句出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前二首为爱情词，后一首为中元灯节的词。三首词都不是说理的，但王国维却从中产生了深刻的哲理联想，发掘出了充满人生哲理的情感智商，概括了从古到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这表明古典诗词作品，尽管题材各异，风格不同，但都可使我们在受到美的熏陶的同时，获得不同层面的人生启迪，从而提高我们的情感智商。

杨叔子先生曾经概括和论述了《论语》所蕴涵的情感智商，认为与美国学者丹尼尔·戈尔曼在《情感智商》中文版前言中所述的五点（前文有所言及）有着惊人的一致。

可见，在我们的学习内容中，注入经典，可以使我们的知识结构变得更为合理，可以使我们作为“人”的人文底蕴变得更为丰厚，可以使我们获得人生的智慧。

[1][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第二节 孔子的家世和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2日——或谓9月28日（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8月27日），卒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2月11日），终年七十三岁。

一、孔子的家世

关于孔子的家世，现存可信文献有《世本》（相传为战国时赵国史官所作，内容主要是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城）、作（制作）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本原为十五篇。《世本》对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先秦时期尝试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行者）、《左传》、《史记·孔子世家》等典籍，其中以《世本》与《史记·孔子世家》最为系统。

春秋时，鲁国孟僖子曾说，孔子是圣人之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遥远的过去说起——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遂从王室转成为诸侯。四传至宋湣公。宋湣公长子弗父何（又称“佛父何”），次子鲋祀。宋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宋炀公。兄终弟及，本是商代原有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想要立他的兄长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考虑到，自己若为君，则当治其弟的弑君之罪，从而酿成新的家庭悲剧。因此，弗父何让而不受。于是，其弟鲋祀立，是为宋厉公，而弗父何仍为卿。弗父何是孔子一系的先祖，于是孔子先世遂由诸侯家又转为公卿之家。因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因此孟僖子乃谓孔子是圣人之后。

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而不自满假，自奉甚俭，修养颇高。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为孔子六世祖。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因获赐族之典，其后代以其先人之字为氏，乃曰孔氏。宋宣公传其弟为穆公，孔父嘉为大司马。穆公又传其兄宣公之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辅佐嗣君。华父督欲弑君，遂先杀孔父嘉，引发了宋国内乱。

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畏华氏之逼，乃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在东防（今费县东北）。孔氏奔鲁后，卿位始失。孔防叔在鲁，虽为大夫，亦只受禄而未有封地，其身份只是士，而不再是贵族。至此，孔子先世遂由贵族公卿转为士族之家。

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大夫，亦称陬叔纥。叔梁纥武力超群，当时以勇著称，立有战功（《左传·襄公十年》有记）。

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无子。有一妾，生男曰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季女徵在，而生孔子。

二、孔子的生平

关于孔子的出生特别有趣的是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的描述：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1]。

这里，“野合”二字颇堪玩味。之所以是“野合”，应是指不合礼仪的男女婚合。据考，当时叔梁纥66岁，已年近古稀，而孔子的母亲颜徵在不满20，乃是青春少女，因年龄相差过大，不合礼仪。故云“野合”。司马迁此一重大实录，所特别具有的思想史意义，是把孔子还原为平凡^[2]。又，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一则与他父母祷于尼丘山（即山东曲阜东南的尼山）有关；一则与他生下来后形相有关：“生而首上圩顶”，圩，凹也，中央低而四周高也。此语意即生下来后，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凹了进去，故取名为“丘”。这表明，孔子之生后形相，亦无神奇之处。当然，孔子长大以后，“长九尺有六，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3]，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孔子的生平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贫寒的少年时代（15岁以前）

孔子三岁那年，父亲孔纥去世。母亲带着他，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即今孔子故宅所在地），没有顶梁柱，孤儿寡母，生活之贫寒可想而知。是母亲在艰难中把孔子抚养成人。

鲁国是周武王胞弟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学养。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音乐（即所谓“周礼”），主要就是由周公制定的。周公长期在周王朝担任执政，他的长子伯禽代他做了鲁国的国君。据传伯禽从周都前去鲁国就国时，带去了其他诸侯国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典册等，于是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伯禽还带去了太史、太卜等文化事务的管理者和官吏。伯禽治理鲁国，严格依据周礼的规定，变化和改革鲁国原来的风俗、礼乐。在伯禽的治理下，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得到了十分完善的保存和发展，故鲁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

孔子八岁那年（公元前544），吴国的公子季札到了鲁国，听到了鲁国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周朝乐歌，还见识了周代以前的音乐歌舞（如使他陶醉的《韶》乐），他特别兴奋。孔子十一岁的时候，晋国使臣韩宣子来到鲁国，他从鲁太史那里见到《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曾“羡慕嫉妒恨”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由此二事，可以见出，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是相对完备和相当悠久的。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春秋末期礼

[1] [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

[2] 胡晓明：《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3] [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14页。

崩乐坏的大时代背景中，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也处在衰颓之中，只不过鲁国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已。

年幼的孔子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孔子童少年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周礼文化的熏染。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孔子母亲颜徵在的娘家颜氏，是当时曲阜的士族。为士者必习礼。颜徵在自幼在娘家时，可能受过礼乐方面的教育。因此，她有条件对孔子进行良好的礼乐教育。这对孔子的成长具有积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俎豆，祭器也。孔子童年玩耍嬉戏，就常以模仿祭祀礼仪，摆列祭器为事。可见，周礼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孩童时代的孔子以礼为嬉，而不像一般儿童那样下河摸鱼，上树捉鸟，他幼小的心灵早已受到周礼文化的滋润。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童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对人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孔子在童少年时代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生计艰难，但所接受的周礼文化传统的熏染，却使他养成了与一般童少年不同的文化心灵。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果然是渊源有自的啊！

第二阶段：劳作和学习的青年时代（15岁—30岁）

由于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孔子年轻时做过一些低贱的“工作”，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贱”“鄙”二字，足见其年轻时地位之低微，这使他能够接近下层民众，熟悉和理解社会底层。孔子二十岁左右时，曾做过“委吏”，负责管理仓库的帐目；又做过“乘田”，其职责是管理牛羊。这也是“官”，但比“弼马温”还不如，都属于“鄙事”。

孔子一边劳作，一边学习。孔子尝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这里的“十五”和“三十”不一定是确数。孔子大体上是在十五岁时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方向。一般认为，孔子之学，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这“六艺”，既包括典章、礼法、文物、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司礼、作乐、射箭、御车、书写的技术和能力。这“六艺”，在当时是一般儒生的进身谋生之途，但若像这样仅为谋求进身贵族阶层，谋一职业，就是孔子所谓的“小人儒”了，孔子曾告子夏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1]故知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学，并不专指六艺的本身，而且还包含着道义的内容。钱穆指出，“孔子之为学，乃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之判，于是乃知所学中有道义。”^[2]，“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3]于此，可见孔子志向之宏大高远与人格之卓尔不凡，换言之，高贵精神在孔子少年时代就已滋润在他的文化心灵之中。孔子择善而从，好学不厌，通过勤奋的学习，终于贯通了六艺，打下了深广而牢固的学问根基，其思想人格也越来越成熟。

[1]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页。

[2]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页。

[3]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1页。

第三阶段：讲学成名的中年时期（30岁—50岁）

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一时期是孔子生命成长和人格完善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三十而立”的“立”，是指立于礼。所谓立于礼，就是指认识了社会人世与礼法而能在社会卓然立足。之所以达到这一境界，是由于孔子学有所成——经过十五年左右的不懈学习，孔子不仅贯通了“六艺”，而且对“诗”“书”“礼”“乐”“易”等文献典籍及其文化精神，都有了精深的掌握，学问有成，思想成熟，于是，三十之后，孔子授徒设教，开始了杏坛讲学的生涯。他“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广收门徒。孔子自云：“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也就是说，无论贫富，不看地位高低，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来作入学拜师礼，孔子都收做学生。他的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1]。孔子培养的学生很多，据说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些学生聚集在孔子周围，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滋润着他们的心田。他们又把孔子的思想传播到四面八方，并逐渐形成儒家学派。

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孔子曾西行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向东周守藏史、后来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聃问礼。在会见老子后，孔子感慨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问礼于老聃”事，是否真有，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此不赘言。

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内乱（季孙氏的季平子把持朝政，并联合孟孙氏、叔孙氏犯上作乱，鲁昭公被迫流亡齐国，鲁国政治陷于混乱之中），孔子去往齐国，希望把齐国的文化传统变得像原来的鲁国一样，并以此来影响当时的鲁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为政理念，颇得齐景公赏识。然而齐国执政大臣晏婴不赞成孔子崇信周礼的主张，并阻难齐景公起用孔子的决定，齐景公最终对孔子绝情，他对孔子说，“我年纪老了，精力不济，无法任用您了。”对孔子下了逐客令。孔子又听闻齐国有人想陷害他，于是不得不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孔子返回鲁国后，继续授徒讲学。生活清淡，而安贫乐道。至于师生之间弦歌诵读、融洽活泼的讲学氛围，则非常动人。此在《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饭疏食”章、“颜渊、季路侍”章、“子欲居九夷”章等章节中沛然可见。

第四阶段：仕鲁之期（50岁—55岁）

公元前505年，季平子死，季桓子起，依然执鲁政，操纵着鲁国的国君。然而此时季氏的大权却操纵在家臣阳虎手里。他甚至囚禁了季桓子（事详《左传·定公五年》）。阳虎欲借孔子之声望以自重，多次要求见孔子，皆为孔子婉拒。《论语·阳货第十七》载：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于是阳货“归孔子豚”，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派人送去了一只蒸熟的小猪。阳货利用古礼，是要令非常讲求古代礼仪制度的孔子不得不见他，手段很高明。

[1] 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页。